

伯希和

〔法〕伯希和 著
耿昇 唐健賓 譯

敦煌石窟筆記



甘肅人民出版社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法〕 伯希和著
耿昇 唐健宾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MISSION PAUL PELLIOU
DOCUMENTS CONSERVES AU MUSEE GUIMET

XI

GROTTE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U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

Vol 1—6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S D'ASIE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ASIE CENTRALE
ET LA HAUTE ASIE
1981—1992

出版说明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原名《沙州千佛洞》，系伯希和1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探险时，在敦煌逗留期间，考察莫高窟时留下的。在法国最早是以《笔记本A》、《笔记本B》的影印件而流传。1981年至1990年，法国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开始整理这部笔记，并在法兰西国家研究中心的资助下正式出版。现在我们提供给读者的这个中译本，就是根据法国分6卷正式出版的法文本翻译而成。我们在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中，感觉到出版这部笔记的中译本，尚须对原法文本做些修正。现将修正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法文本中，曾收录了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考察壁画和洞窟建筑时拍摄的大量珍贵黑白照片，前5卷有326幅之多。这些照片在法文本中多是随文编排，对提高读者阅读此书的直观性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这次我们出版中译本时没有收录这些照片，原因是，法文本披露的照片已无法翻拍使用，而译者又无法找到原版底片。故原书中附录的照片只好放弃不用，这是很可惜的。

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法文本是分卷出版的，共六卷。前五卷每卷附有“前言”、“序言”和“敦煌石窟各家编号对照表”各一篇。出于技术上的需要，我们这次在中译本中将各卷的前言、序言和敦煌石窟各家对照表集中依次编排，故现在读

者看到的前言、序言各由五个部分组成，而敦煌石窟编号各家对照表则变成了相互连贯的五个表。考虑到前言、序言在分卷出版时可能出自不同的人之手，我们将在前言和序中采用当页注的形式加以说明。第六卷，因译者是根据新近即将出版的法文本的清样翻译而成，现在还无法确知有无序言、前言和敦煌石窟第146a—182号洞各家编号对照表，以及序、前言系何人所作，故此阙如。此外，为了表明现在的六卷本每卷的内容仍是依照法文本的六卷的编排顺序照译，我们在各卷之前加了插页并标明了卷次。

三、这次出版中译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时，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部书，在原法文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内容。一是增加了“译者的话”，主要对伯希和其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产生及其价值作了简要说明。二是增加了“后记”，主要对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出版问世的漫长过程作了简要说明。

四、《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法文本中抄录有大量的壁画汉文题识、题献、榜题。这些题识、题献、榜题当中有大量的繁体字和俗写字。这次出版中译本时，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将这些繁体字一律规范为标准的简体字，而对其中的俗写字，因无法确知其音、义，故仍原样保留。

五、为了保持《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原貌，我们对法文本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的错处也没有作更多的修改，如卷目中每卷所含石窟的序号，按一般情况，上卷的最后一个序号和下卷起首的第一个序号，应该是紧连的两个数字，而不应该是同一个数字，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第四卷的最后一个石窟的序号和第五卷的起首一个石窟序号却是同一个数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只是以注的形式提醒读者，对原文未加更正。另外，译稿中多次“见笔记本A”、“见笔记本B”的字眼，因为我们未见

到笔记本A和笔记本B，无法确知其内容，又不便删除或注解，故原样保留，谨此说明。

编 者

1992年春

前 言

(一)

1908年2月25日，在敦煌作暂短的逗留之后，伯希和来到千佛洞。探险团的摄影师夏尔·努埃特在医生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的陪同下，作为伯希和的先遣，提前来到。努埃特利用提前到来的几天时间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并绘制了一幅石窟分布平面草图，正如伯希和在日记里记载的那样。伯希和一经抵达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他拟订了石窟的描述提纲并把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涂鸦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但是从3月初开始，这项活动因故突然终止，伯希和有一项更为紧迫的任务，他终于来到了“至圣所”——一个于1900年发现的与第16号石窟（伯编第163号）相毗邻的著名小石室，那里满室都堆满了写本。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伯希和度过了整整3个星期，他有条不紊地清查整理了这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暗室的全部写本和绘画等。他在4月27日交给驿站一封从千佛洞寄给塞纳尔（E·Senart）的信中汇报了这第一次清点的成果，这是一封长信，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全信长达75页之多。数月后，这封信就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上发表了^①。从3月27日起，伯希和又重新开始对石窟进行描述并清理抄录各种题识。工作结

^①伯希和：《在甘肃发现的一座中世纪藏书室》，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1908年，第500—529页。

束后，他于5月27日离开千佛洞回到敦煌，他在5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29周岁生日，我写了整整一天的信”。

伯希和从千佛洞带回了一些手稿，活动画幅及若干雕刻品。这些至今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的文物已逐渐开始发表并还将继续公布。与此同时还有石窟内外的照片和他到过的石窟的位置及对内部装饰的描述，此外还附有各种画幅和雕塑的分布情况等，特别是他从墙上或石碑上解读后抄录下来的题识。1922年和1924年间，全部照片已分3卷出版^①。

1945年，伯希和去世后，包括全部描述的所有笔记本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吉美博物馆保存^②。共计有两本活页簿，有单页的，也有双页的，全用墨水书写。第一集（笔记本A）共67页，开本为 $0.20\text{m} \times 0.16\text{m}$ 。第二集（笔记本B）共92页，开本为 $0.23\text{m} \times 0.18\text{m}$ 。在描写所有石窟时，伯希和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他先写“口内右壁”或“口内左壁”^③。在描写过程中，他还把所有的题识和游人题记都记录下来，并常常仔细地附上一张说明题识在洞壁位置的草图。此外，对每一组题识都编了号。

今天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只是在于以我们认为比较方便的方式向研究人员提供一部长年以来难以到手的材料。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原始笔记本里加上各种照片，鉴于文字篇幅太大，我们不得不只先公布前30个石窟的描述。这种划分法其实与伯希和自己在出版敦煌千佛洞照片分卷时所作的划分是相吻合的，当时他在简短的前言里宣布将出版包括“石窟描述、石窟年代、壁画的考订、题识解释”等内容的著作^④。

①《伯希和考察团档案I敦煌石窟》第1—6卷，巴黎1922—1924版。

②吉美博物馆图书馆，伯希和手稿347。

③除了伯希和考察团所作的石窟编号外，还有中国研究人员和敦煌研究所进行的其它编号，参阅陈祚龙：《敦煌石窟编号对照表》，载《亚细亚学报》第201卷，1962年，第2期，第257—276页。

④《伯希和考察团档案I敦煌石窟》，第1卷，第6页。

本书的出版曾得到吉美博物馆宗教部负责人弗朗西纳·蒂索 (Francine Tissot) 夫人和罗贝尔·热拉—贝扎尔 (Robert Jera—Bezard) 先生的宝贵协助, 是他们两位承担了伯希和笔记本全部稿页的照片工作。由于他们仔细耐心的工作, 使拍摄任务得以在最好的技术条件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热拉—贝扎尔先生还负责对伯希和考察团在当地所拍摄胶片的新印照片进行核对。仅在此向他们二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也要感谢吉美博物馆主任保管员让尼纳·奥布瓦耶 (Jeannine Auboyer) 夫人, 没有她的同情、理解和不懈的毅力, 这项工作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我们还要感谢吉美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埃斯泰·列维、安托瓦内特·奥奇科纳 (Antoinette Hauchecorne) 小姐和弗朗西·马库安 (Francis Macouins) 先生以及博物馆照相技术室的负责人等, 是他们的友好合作为我们的复杂研究提供了方便。

我们十分感谢陈敏明太太, 她不仅书写了一部分无法进行印刷的题识, 还重新抄写了伯希和文稿部分里的全部汉文方块字。

本卷仅是整个集子中的第1卷, 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内, 将继续按期出版。本书由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编辑并印刷。

(二)

伯希和有关敦煌千佛洞的笔记本第2卷中包括对31—72号石窟的记述以及他对自己能释读出来的题识的录文。这第2卷虽然比第1卷要简短, 然而它却涉及到了对其壁画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意义的石窟的描述, 同时还包括一些解释该地区及几个供养人家族历史的题识。

在这一卷中, 我们再也不会发现各榜题的位置图了, 因为伯希和于此时已放弃了这种作法。另外, 那些希望参阅伯希和原笔

记本影印件的读者在研究同一个石窟时应由笔记本A依次读到笔记本B。有时还常常需要回头来看，因为伯希和并非始终都按照摄影师努埃特为他编号的顺序——研究这些佛洞（努埃特先于他数日抵达千佛洞）。

在对石窟的描述中，为了形容他所研究的绘画之风格，伯希和使用了“古老的”、“最早的”和“常见的”等术语。在他记述千佛洞的笔记本的任何一页中都不会发现对这种分类法的解释，因为他觉得这十分自然。在至今尚未发表的他致赛纳尔（E. Senart，伯希和在中国新疆停留期间的一位有幸与他保持通讯关系的人）的信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些比较丰富的解释。这封信的时间为1908年5月28日，也就是在伯希和即将离开千佛洞的前夕。在该信第7页上，我们可以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在千佛洞中，必须区别3个较大的时代，为了不使将来的命名具有任何成见，我暂定为‘最早的风格’、‘古老的风格’和‘常见的风格’。‘最早的风格’从6世纪（？）到唐王朝开国（公元7世纪初叶）；‘古老的风格’基本上包括了整个7世纪；‘常见的风格’带有各种细小变化，从7世纪末一直到11世纪”。我们觉得摘引该书信的这段文字是合适的，即使是从那时以来所从事的研究可以使更准确地确定许多问题和更精确地考证许多洞窟的时间也罢。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对照表中指出自伯希和经过之后而剥离出的比他本人所研究过的更为古老的画层。

在这幅敦煌石窟各种编号的对照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伯希和所编第50a、51a和51b号石窟的对照似乎不太肯定。

对于第1卷文中的某些错误没有及时进行勘误，现在需要指出来（第1卷译文中已根据勘误表进行了修改，于此略去。——译者）。

完全如同对待第1卷一样，对原幅照片的冲放是由蒂索

(Francine Tissot)夫人和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先生所作,热拉—贝扎尔还负责制订了编号对照表。

第2卷笔记的准备和印刷任务是由法兰西学院研究所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承担的。本出版物享受到了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三)

我们非常高兴地向研究者们介绍《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3卷,这仅在第2卷出版之后几个月的时间。这里是指对第72—111a号石窟的描述及抄录的题识。尽管伯希和参观过的石窟数量很多,所抄录的全部题识似乎显得不太丰富。然而,如果把他抄录的题识与其他那些曾参观过莫高窟的人如史岩的录文作一番比较,那很快就会看到,伯希和笔记本中抄录的题识还是最多或最为完整的。在此期间,已度过了许多年。

从其它方面来看,伯希和笔记本提供了对现在引起了很大兴趣的圣像学艺术品以及伴随着佛陀“著名形象”的题识(第64、81、84、106号……等石窟)的介绍。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第106(敦煌所编第72)号石窟中,于左披上绘有刘萨诃和尚故事的画面,最近在法国和外国都发表了数篇有关他的文章,都指出了他在当地佛教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伯希和抄录的题识于此可以作出某些有意义的澄清。

在由罗伯尔·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先生编制的石窟编号对照表中,他考虑到了最新的断代,特别是在《中国石窟艺术·敦煌莫高窟》(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纂和出版,1—5卷,平凡社,东京1980—1982年版)中的断代。由于这一出版物,现在可以更为可靠地编制第108和108a号洞的对照表了。伯希和编第108a号洞确实相当于敦煌所编第71号洞。我们对《伯希和档案·敦煌石窟》第3卷第188幅图版和《中国石窟艺

术·敦煌莫高窟》第3卷第86幅图版的比较就可以不再有任何疑问了。此外，彩色图版完全可以证实这个具有非常优美风格的小洞中的壁画之美。伯希和发表的片断确实是属于阿弥陀净土变的一部分，完全如同在本世纪初拍摄的照片令人猜测到的那样。

我们最后还要指出伯希和有关“疏勒”地区（他就是这样称呼新疆省南部地区的）对古老时代石窟装饰影响的判断之正确性。我们这里意指那些在其中存在一个拱形过道，从而可以使人围绕中央祭坛（大家也把在塔里木盆地挖掘的佛刹称为“巨柱形窄堵波”）而绕一周的石窟。在伯希和笔记本中，第76（敦煌所编第246）号石窟的情况即属此类，即使是它在稍晚时代又重新装饰过也罢。

我们觉得有必要利用这些解释提醒读者注意指导这一整套出刊物的原则。其中包括的伯希和对敦煌石窟的描述和抄录的题识是以两本小笔记本的形式出现的，我们为了方便而简称之为“笔记本A”和“笔记本B”。伯希和是随着自己的参观而陆续记录的，当他发现一个或另一个石窟值得进入深入研究时便又信步返了回来；对同一个石窟的描述或对其题识的抄录可以写在这一本或那一本笔记本中。此外，他也并不是始终都按照严格的顺序而描述石窟的。为了便于发表，我们把有关同一石窟的所有资料都汇编到一起了。因此，想参阅手迹影印件的读者应注意这种事实。

王联曾先生对“俗字”的抄写始终都尊重原来伯希和的写法。但是为了压缩转抄题识的图版，王联曾仅在那些他觉得奇怪的字体旁边注明伯希和原来记载的“原文”。

书中出现的汉字都是由陈明敏夫人抄的，如同在前两卷中一样。对伯希和的摄影师努埃特（V·Nouette）原胶卷的复核和翻印是由R·热拉—贝扎尔先生完成的。在弗朗西纳·蒂索（Francine Tissot）夫人的帮助下，他还翻拍了笔记本中的原

叶真迹。

随着这几卷笔记的陆续出版，我们将编制一篇索引，在最后一卷中发表。

这第3卷的编纂和印刷都是由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承担的。此书享受了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四)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4卷介绍了他自己编号的第112—120n号洞。这一组石窟往往都很小，沿山麓分3层，甚至是4层重叠开凿的，基本占据了莫高窟遗址的中心地带。近期的研究已证明，在那里存在3个可以追溯到北凉时代（即5世纪初叶）的石窟，因而属于最早建造的石窟之列。这3个洞子分别为第120i（敦268）、118j（敦272）、118m和n（敦275），它们并没有引起伯希和的多大注意。他针对这些石窟仅简单地指出，在常见风格的装饰层之下存在着更为古老的另一画层。但这些洞子中没有保留下题识，他没有于此多耽搁时间也未让人拍照。然而，他在第118j号洞子中发现了“脚平放在小凳子上趺坐在那里”的祭坛上的佛陀。近期的出版物使我们恢复了这些绘画逼真的美，其中本生事的画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我们顺便还应指出，最古老的石窟位于这一建筑群的中央，正如我们经常由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徒们修缮的一批山岩佛寺中发现的那样。

伯希和笔记本中还提供了有关佛教圣地修缮的不同阶段的颇有意义的具体情节。例如，伯希和曾长时间地注意第119（敦编第453）号石窟，并指出其平台可能堵塞了“7—8个小洞”。自从他经过那里之后，敦煌研究所设法挖开了这些洞，它们都是在

①《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第4—19幅画。

山脚下开凿的。我们于此颇感兴趣地指出，如果在元代之后的14世纪期间，敦煌画家们的活动慢慢地销声匿迹了，但圣址仍继续接待朝圣进香人的来访和从事修缮。第119号洞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因为在18世纪初叶，此洞还遭到过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因此，莫高窟并不象大家经常所说的那样被彻底遗弃了。

伯希和在对第118d（敦56—5）号洞的描述中，极为关注颜色的变化，从而得出了作为后来研究方向的引人注目的推论。他指出自己提取了“未因空气而变化的古老颜色的样品”。这些样品在他携往欧洲的考古搜蒐品目录中登记为第927号。我们可以从中读到这样的记载：“927号，9×12厘米的一小盒，内盛取自石窟中的颜色样品”。这些样品现藏吉美博物馆的收藏品中，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未对它们作过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分析。

我们无须再一次指出伯希和在莫高窟遗址所作的笔记的重要性，但还想指出另一例证。伯希和长时间地研究了第120n（敦285）号石窟，详细地描述了其壁画并试图具体考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该圣址所作的大量修缮，况且他拍摄的照片为我们复原了在撤销增补建筑的修复工程之前洞子的外貌。此外，他录下了尚能释读的全部题识。如果把他的释读与近期的照片比较之后，那么我们会看到某些题识已遭到了严重损坏，如前壁上题识的近一半（第6幅画面）已消失^①。

对于第117号洞中五台山图中题识的释读，需要作两处澄清。首先是在第33条题识中，抄录中遗漏了4个字，应该在末尾补充“门西南路”。在78条题识中“卉”字被伯希和读作“院”字了。

本伯希和笔记本第4卷原叶的影印复制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某些叶中，墨迹非常暗淡，不可能制成最逼真的复制品。

^①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第128幅图版。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伯希和对第120n号洞所作的描述边缘记下的笔记中。这都是一些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小字笔记。当拍摄这几叶笔记的照片时，它们就已经非常模糊不清了。此外，这里记载的也可能是伯希和晚期返回法国之后所作的感想，即当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敦煌壁画课时记下的。

在第120f号洞中右上角和第120g号洞中左壁的第246号图版的问题上，又提出另一个问题。现已根据吉美博物馆所藏的原胶印本而重新制版，如果将之与载1920—1924年的刊本中的图版作以比较，即就会看看图版是倒置的。R·热拉—贝扎尔先生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现象，如同前几卷一样，他也负责监制图版。由于没有掌握解决这个问题的足够的决定性资料，我们于此仅能向读者指出这种事实。

在作总结之前，还应该讲几句有关在编制敦煌石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时遇到的困难。对于某些石窟，在已发表的各种对照表中存在着矛盾，对于其它的石窟来说，尚未找到敦煌研究所相对应的编号。

在完成这一卷伯希和笔记的出版时，我们必须向陈明敏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她抄写了本书中的汉文。此外，她还誊清了第272—279幅题识图版，它们是在初稿的抄本中找到的。根据原胶印本而重新印制的版本是由热拉—贝扎尔先生完成的，他还与F·蒂索夫人合作完成了对原笔记本各叶的拍摄。

本卷的编写与印刷是由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承担的。本书享受到了国立科研中心的资助。

(五)

本卷所描述的石窟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一组，它从第119(敦编第453)号洞的高度开始。从这一伽蓝开始，在150多米长的地方，石窟共开凿了3层，甚至有时是4层。在许多情况下，它们

曾被多次翻修过，有的甚至是在敦煌画家们活动的最后时代翻修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编制自本世纪初以来对这些石窟不同编号的对照表变得困难了。我们在前几卷中已指出了主要的不规则性。但是，除此之外，对于这一组石窟来说，我们发现在多种对照表中，有几个伯希和编号的石窟在伯希和于他参观莫高窟遗址时所作的笔记中未曾描述过。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这一组石窟来说，最好是重新从第120a（敦编第52）号洞开始编制对照表，我们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减少最为明显的矛盾处。大家于此又发现了导致我们编制这些新对照表的原因。

伯希和考察团的摄影师努埃特曾对他在那里停留时能够进入的石窟作了编号。他在伯希和本人到达敦煌之前不久完成了这项工作。努埃特的编号是按照大片纵切面而编制的。从此之后，中国的研究者们，尤其是敦煌所的研究人员又编制了按照横切面而组织的编号。对于开凿于崖壁下部的几层石窟是自右至左开始编号的，对于第3和第4层石窟则是自左至右连续编号的。

努埃特使用的编号体系可以由他为拍摄石窟取景而使用的照相机的大镜头来解释。无论如何，考虑到这种事实，这是一种把崖壁切成纵截面而进行编号的办法（努埃特的编号）；另一种是最新的编号法，即把洞区切割成横条。我们只有这样才可以试解决在已发表的不同敦煌石窟编号对照表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还应牢记伯希和本人在他对各石窟作笔记时进行编号的方式。当涉及到一批复杂的石窟时，伯希和为了对这些道场进行区别，使用了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并附有一个小写拉丁字母。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也使用一个大写字母来持续其编号表（如第120a号和第120A号洞）。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于1924年发表其几卷敦煌图录时，并未始终都遵守这些大写和小写字母之间的

区别，而在其笔记本的行文中有时则非常清晰可读^①。这种混乱无疑是在编制对照表时所发生的许多错误的根源。在这一方面，由伯希和本人发表的几卷黑白图版在长时间内一直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史料。我们在准备发表伯希和的前几卷笔记而编制敦煌石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时也遇到了这个难题。

此外，自从伯希和参观过之后，由敦煌所从事的维修工程彻底清理出了一大批在伯希和参观时只能部分看到的石窟。

我们于此仅关心石窟编号的对照问题，它可以根据我们在巴黎能得到的文献而提出或部分解决。

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在某些对照表中登录的伯希和编第120W号的石窟并未在其笔记中有所描述。发表于《敦煌石窟》的平面图中的某些印刷错误未能校正。所以，被称为第120x号的石窟在伯希和的平面图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最靠左部的一个石窟）确实相当于敦煌所编第448号洞。第二个实际上是被伯希和描述为第120Z号洞者，它紧靠第120A（敦编第443/444）号洞。最近发表的彩色图版说明^②，该窟中的壁画被烟熏得非常严重，正如伯希和在经过那里时所指出的那样。

伯希和的笔记未描述第124b号洞。但如果把分别由敦煌所和伯希和编制的平面图作以比较，那就可以提出如下对照：第124（敦编第435）号洞相当于第124a（敦编第436）号洞^③。我们在伯希和对第126f号洞的笔记中未发现任何踪迹。伯希和描述了第126号洞，第126a和126b号洞与之并存，它们与敦煌所编号的对应关系已完全得到了证实。

①例如，第120n号洞的情况即如此。伯希和在《敦煌石窟》第4卷末作第120n号洞，但在第5卷开头处则又作第120N号洞。

②《中国的石窟·敦煌莫高窟》第3卷，图第171—177。

③我们所使用的两幅平面图分别引自：伯希和：《敦煌石窟》第1卷，巴黎1924年版；《中国的石窟·莫高窟》第1卷，平凡社1980年版。